美国早期汉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观念
——从裨治文的《中国丛报》到威尔逊的《中国文学》

张 源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早期英美汉学家对于译介对象的最初选取与侧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西方世界“中国文学”观念的基本面貌。英美两国传教士由于语言与文化交流方面的便利,以及工作与生活上的密切联系,其译介与研究工作很自然地彼此交织,并在英语世界共同发挥着影响。美国汉学在开山时期一方面呈现出兼容博杂的面貌,更由于其世界性的眼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中国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谱系中重新加以审视,传统的经典再次获得了崭新的意义。

关键词: 美国早期汉学;中国文学观念;伊皮法纽·威尔逊的《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 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6-0070-06

关于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总体认识,或者说西方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英美传教士与外交人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早期汉学家们最初的对于译介对象的选取与侧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西方世界“中国文学”观念的基本面貌。美国早期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状况,中国学界相对而言关注较少。本文将从美国早期中国文学译介原典入手,与同期英国汉学家的译介成就比对而观,分析美国文本的主要特征及生成原因。

首先需要说明,关于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存在多种分法:如分为早期、中期、后期的三阶段分法,或分为业余时期、专业时期的二阶段分法,以及从儒学传播视角出发的五阶段分法等等,其中对于美国汉学“早期”阶段的界定亦随之有所不同。本文将美国早期汉学时限划定在 1830—1900 年间:1830 年是美国第一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1801-1861)抵达北京的年份,也是与中国发生实际接触的美国汉学元年;1900 年则是伊皮法纽·威尔逊(Epiphanius Wilson,1845-1916)①出版发行《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②的年份,这是第一部美国人出版的以《中国文学》为题的书

收稿日期:2020-02-02

作者简介:张源,女,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6)阶段性成果。

① 伊皮法纽·威尔逊的生平罕为人知,这与他对世界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殊不相称。他于 1845 年生于英国利物浦,后来移居美国,身为诗人与丛书主编,诗歌见录于《美国文学文库》(1891),编辑出版了《最伟大的世界文学》(*World's Greatest Literature*)(1900-1901)系列丛书(其中《土耳其文学》部分篇章出自他的译笔),并为每一部书籍撰写了导语,1916 年死于纽约布朗克斯维尔。[Born in Liverpool, England, 1845. Died in Bronxville, N. Y., 1916]——这是《美国文学文库》(Stedman and Hutchinson, *A Libra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in Eleven Volumes*, 1891, Vols. IX-XI: Literature of the Republic, Part IV., 1861-1889)介绍作为诗人的伊皮法纽·威尔逊仅有的一行简短描述。

② 《中国文学》曾以单行本发行(*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New York: Colonial Press, 1900),后与另一个单行本《东方文学 阿拉伯文学》(*Oriental Literature The Literature of Arabia*, London/New York: Colonial Press, 1900)合并发行,题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学》(*Chinese and Arabian Literature*, London/New York: Colonial Press, 1900),此为我们今天通常所见的版本。

籍,①这一年也是十九世纪结束之年。

美国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工作最初是在英国汉学家的支持与影响下开启的,双方始终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如美国第一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于 1830 年抵达北京,受到了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的新教传教士、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欢迎,六年后裨治文成为马礼逊教育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从此担任通讯秘书一职;另一位重要的美国早期汉学家、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1814-1884)于 1833 年抵达广州,随即接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印刷所,1842 年被选为马礼逊教育协会的通讯秘书;还有后来成为美国圣公会主教的文牧师(William Jones Boone,1812-1864)1840 年来到澳门,次年担负起了管理马礼逊学校的重要职责等等,不一而足。② 反过来,美国传教士群体也给予了英国汉学家以支持,如伦敦传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名著《中国文献纪略:附关于文艺进步之导言及译成各种欧洲语言的汉语作品列表》(1867)最初就是由美国长老会教会出版社印行推出的。③ 英美两国传教士由于语言与文化交流方面的便利,以及工作与生活上的密切联系,其译介与研究工作很自然地彼此交织,并在英语世界共同发挥着影响。

1832 年,裨治文主创《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④1833 年由卫三畏协助出版,1847 年之后卫三畏代为负责编撰工作。该刊于 1832 年 5 月至 1851 年 12 月在广州/澳门共出版 20 卷,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英文刊物之一。⑤ 我们知道,一份刊物的体量超过任何一部专书,内容相应会更加丰富驳杂,也会吸引到更多层面的不同受众,《中国丛报》在介绍中国典籍方面即呈现出了丰富驳杂、兼容并包的特色:其中儒家经典部分除《四书》《五经》等“常规”内容之外,还扩展到了“十三经”的范围,如《尔雅》《孝经》等,就此而言走到了同一时期英国传教士的前面,此外,朱子著述最早被归入了“哲学”类,此亦值得我们关注;蒙学方面,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外,还重点介

---

① 在此之前,英国外交官翟理斯著有《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伦敦/上海,1884),该书 1900 年以前似未见在美国印行出版。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的名著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文通译为《中国文献记略》,上海/伦敦,1867 年),似直至 1964 年才出现美国发行版本(*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值得注意的是,威尔逊的《中国文学》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发行一年之后,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也随之在美国和英国同时登台亮相了(Herbert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

② 见《1867 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4、82—83、105 页。

③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 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London: Trubner and Company, 1867.

④ 裨治文还曾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8-1948)主编(1858-1860),1861 年裨治文去世后,该刊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接管。裨治文担任主编期间,除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所撰“墨子略述”“道教神话”“孔子生平”等三篇外,各期文章无涉乎中国经典文献文学者(见《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1858-1948)导论·索引·附录》,上海图书馆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 年),故本文未做讨论。

⑤ 我们在此仅关注与中国经典文献文学西传有关的英文报刊,凡是面向国人所办的中文刊物,如美国传教士华美德(Marquis Lafayette Wood)与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曾先后担任编辑的《上海新报》(1861 年 11 月—1872 年 12 月)、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1868 年 9 月—1907 年 7 月)、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等人创办的《中西闻见录》(1872 年 8 月—1875 年 8 月)等等,以及虽为英文报刊,却无涉乎中国经典文献文学,如 1842 年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外交官联合成立的“美国东方学会”主办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4 年迄今)(本文搜索范围为 1844—1900)等刊物,虽然各具重大影响,均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绍了《小学》(五期连载)以及《押韵幼儿诗集》等;历史著作方面介绍了《史记》《三皇纪》《三国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明史》《至圣编年世纪》等;不仅是上述中国传统著述,就连中国全面介绍西方的最新综合性图书,如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1852)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48)等也进入了编者的视野。

在中国文学方面,《中国丛报》选刊内容尤为丰富多彩,包括小说、戏剧、游记等多种类型的作品:小说类包括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五虎平南狄青后传》《南宋志传》①和《大明正德皇帝游江南》,神怪小说《聊斋志异》《子不语》《搜神记》(三期分载)《神仙通鉴》(两期连载)《香山宝卷》等,世情小说《红楼梦》《谢小娥传》《王娇鸾百年长恨》《灌园叟晚逢仙女》等;戏剧方面,登载有《中国戏剧评论》一文(该文纠正了欧洲人“中国没有戏剧艺术”的错误观念,文后并附喜剧《补瓷匠》),推介了法国汉学家巴赞的《元剧选辑》(巴黎:1838 年);游记方面,载有著名的佛教文学作品《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此外还有《全集》两种,《苏东坡全集》与《榕园全集》;以及其他通俗文学作品,如具有劝诫性质的唐寅的《百忍歌》、张礼承的《醒世宝言》等。②

在美国汉学起步时期,《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与卫三畏表现出了宏阔的视野与兼容并包的眼光,这很有可能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影响(见前所述)有关。“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真正奠基者”马礼逊(伟烈亚力语)③1825 年出版了一部《中国杂记》,这是英国传教士第一部试图对中国文献进行整体介绍的作品,书中将“中国文学”分为十一类:1. 中国经典(四书五经),2. 中国历史,3. 历史小说,4. 戏剧(作者指出这一部类与上一部类、即戏剧与历史小说在中国均非“受人尊重”的文学),5. 诗歌(作者认为中国没有“史诗”这一门类),6. 杂文(主体大致为中国传统的“子”部),7. 地理或地方志,8. 医学著作,9. 天文学著作,10. 散文(主体大致为中国传统的“集”部),11. 三教(儒释道)思想著述(接下来马礼逊仅重点介绍了四书五经、即第一部类)。④ 可见马礼逊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几乎囊括了一切文类,呈现出最为广泛的义涵。

此后,英国外交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于 1836 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一书,其论述思路与马礼逊有所不同:作者选择将儒家经典别分一章(见第十二章“宗教-儒家”)加以讨论,并开辟新的章节(第十六、十七章)介绍了中国的“美文学”(*Belles Lettres*),包括戏剧、诗歌、小说等纯文学,并讨论了与之有关的舞台演出、人物性格、情节场景、语言结构等等问题。⑤ 两相对照,马礼逊与德庇时的文学观念一取广义,一取狭义,⑥此后英国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译介随之形成了两种路数:如英国公理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与伦敦传道会传教士

---

① 《南宋志传》在《中国丛报》(1842 年第 11 卷第 10 期)英译名为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南宋史》),另一份由美国传教士主办的著名刊物《教务杂志》(1867 年 1 月—1941 年 10 月)曾于 1868-1869 年间分七期刊载了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南宋史》),不知是否与《中国丛报》的译介有关。

② 参见《〈中国丛报〉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顾钧,杨慧玲整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3.

④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Miscellany*, London: S. McDowall, 1825.

⑤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chapter XVI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chapter XVII Literature (continued), London: Charles Knight and Company, 1836, pp. 243-271.

⑥ 英文中的 literature 一词,其传统(广义)概念包括“文学”“文献”“著述”“资料”等义涵,与我国对于“文学”的传统观念堪可对应。西方在 18、19 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时代,literature 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狭义)概念,即“纯文学”或“美文学”,我国的现代“文学”概念亦深受其影响。以现代眼光来看,称《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为“文学”似乎不甚妥帖,其实西方汉学家使用 literature 一词如系广义,不妨即以中文广义上的“文学”观念对译之,如系狭义,则可译为“纯文学”。

郭实猎(Karl Friedrich Gützlaff,1803-1851)于 1838 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关于福音传播的现状与前景》与《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地理、历史、风俗、习惯、艺术、制造、商业、文学、宗教以及法律等概览》,其中对于中国文学的介绍基本上延续了马礼逊的做法;①而伦敦会传教士基德(Samuel Kidd,1799-1843)1841 年出版了《中国:图解中国人的信仰、哲学、古物、习惯、迷信、法律、政府、教育、文学》一书,②其中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则更贴近德庇时的路数。

1848 年,卫三畏出版了美国汉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国总论》,这是美国人完成的最早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综合性学术论著,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汉学的开端。书中有两章关于中国文学,分别为第十一章"中国经典文学"(Classical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与第十二章"中国雅文学"(Polite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中国经典文学"包括:1. 钦定目录作为中国文学索引,2. 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3.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后附"孔子生平"与"儒家伦理体系的特点",《孟子》后附"孟子生平及其教谕的个人特点"),以及 4.《康熙字典》。"中国雅文学"包括:1."中国修饰性文学的特点",2. 中国历史著作,3. 历史小说(继承马礼逊的做法,将中国历史著作与历史小说前后分列),4.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5. 哲学著作:朱熹论原动力(继承《中国丛报》的做法,1844 年两期连载《朱子哲学》),6. 军事 . 法律与农业著作,7.《康熙圣谕》,8. 艺术 . 科学类著作与百科全书,9. 中国小说的特点即示例,10. 诗歌:李太白的故事,11. 现代歌曲与即兴诗作,12. 戏剧文学 . 喜歌剧,13.《补瓷匠》:一个滑稽剧(《中国丛报》曾于 1838 年刊出),14. 论中国文学的缺陷与局限,15. 中国谚语集。③

我们看到,卫三畏的"中国文学"观念直接继承自马礼逊,即将各类文献都归入"文学"大类,同时也融合了德庇时的二分法,即将儒家经典与其他各类文献分而论之。卫三畏的这一分类法极具影响:1867 年美国传教士麦利和(R. S. Maclay,1824-1907)、保灵(S. L. Baldwin)、裴来尔(L. N. Wheeler,1839-1893)创办了著名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④该刊虽以美国基督教在华各差会互通情况、讨论教务,并对中国政局发表意见为务,但同时刊登了大量中国典籍译介文章,⑤该刊还载有中国文学专论若干,杂志创办者麦利和撰写的《中国经典文学》(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⑥一文尤其值得注意,该文认为"中国经典文学"共有九部(即五经四书)并一一进行了介绍,无论从题目还是内容而言,都可见出卫三畏《中国总论》第十一章"中国经典文学"(Classical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之影响。顺便提及,自麦利和《中国经典文学》一文发表之年(1878)开始,《教务杂志》陆续推出了评介卫三畏所编字典《汉英韵府》(1878)的文章(分两期共三篇),并对卫三畏的学术乃至个人做了专文介绍。此外,《中国总论》当中的中国文学分类或许也对伟烈亚力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卫三畏曾将《康熙字典》与四书五经一并纳入"中国经典文学",伟烈亚力则在那部以"中国文学"(*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译《中

①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chapter VII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ondon, 1838, pp.158-162. Karl Friedrich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chapter XII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1838, pp.416-419.

② Samuel Kidd, *China, or 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 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 Laws,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Section VII, London, 1841, pp.350-367.

③ Samuel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New York/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④ 《教务杂志》(1867 年 1 月—1941 年 10 月)曾数次更名,如《传教士纪事》《中国纪事和传教士杂志》《中国纪事》等等,我们循例统称为《教务杂志》(1915 年该杂志封面确定此汉译名)。杂志初期由裴来尔任主编,1868 年之后由保灵任主编,直至 1915 年由美国传教士乐灵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1871-1937)接替主编职务。

⑤ 限于篇幅,具体情况容后再谈。可参见《边缘风景:〈教务杂志〉与传教士汉学知识传播》,薛维华著,2015 年博士论文,张西平教授指导,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⑥ *Chinese Recorder*, 1878. 1-2, vol. 9, pp. 49-62.

国文献纪略》)为题的著作中,将各类字典与四书五经并列纳入第一部类-经部(Classics),其中除四书五经外,还包括《孝经》《尔雅》以及重要字典,这些字典依据不同功能分又为三类,第一类为主题分类词典(《尔雅》也归于此类),第二类为偏旁部首类字典(典型代表为《康熙字典》),第三类为声韵类(如《广韵》《集韵》等。

卫三畏的提法极具影响,但亦有其问题:如论及“中国雅文学”,中国历史小说、戏剧文学、现代歌曲未见得尽雅,特别是滑稽剧《补瓷匠》更难归入“雅文学”之列。卫三畏的融合之举更似一种杂糅,反倒不如马礼逊和德庇时的做法各有理据。裨治文与卫三畏的编辑与著述成就很可代表美国汉学开山时期兼容博杂的面貌,而这一风格实际上就此延续下来,成了十九世纪美国汉学的整体特色。直至 1897 年,美国传教士丁义华(E. W. Thwing,1868-?)著专文介绍“中国小说”,①仍将《十才子书》(包括《三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燕冷》《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花笺》《平鬼传》《白圭传》)、《四大奇书》(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东周列国》《今古奇观》《红楼梦》《荡寇志》《子不语》等等与《列女传》乃至《二十四史》并列而论,似完全无视于三十年前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对中国文献做出的经典性分类举要,②其分类意识之淡漠,真可谓驳杂不纯。

1900 年,美国人伊皮法纽·威尔逊同时在英美两国出版发行了《中国文学》一书,全书分为五部分:1.《论语》二十章全译;2.《孟子》选译(包括《梁惠王上》《万章上》两篇);3.《诗经》选译(分别选编了《风》《雅》《颂》部分诗歌);4.《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此处译作《法显游记》)全译;5.《汉宫秋》全译。我们看到,该书继续无视伟烈亚力《中国文献记略》所作的经典性分类举要,从儒家经典《论语》《孟子》《诗经》到佛教文学《佛国记》再到元杂剧《汉宫秋》,在内容编排上未做任何解说而统称之为“中国文学”,作为第一部美国人出版的以《中国文学》为题的书籍,从中亦颇可见出美国十九世纪汉学兼容博杂的特色。

但这部书仍具有同类作品无可比拟的优点:该书乃是伊皮法纽·威尔逊主编的《最伟大的世界文学》(*World's Greatest Literature*)系列丛书之一,与《印度文学》(1900)、《东方文学-阿拉伯文学》(1900)、《日本文学》(1900)、《波斯文学》(1900)、《埃及文学》(1901)、《希伯来文学》(1901)、《土耳其文学》(1901)、《巴比伦与亚述文学》(1901)、《摩尔与马来文学》(1901)等世界各国文学经典(共计 10 种)联合推出,当中国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谱系中重新加以审视,那些传统经典再次获得了崭新的意义。

此外,在上述系列当中,只有《中国文学》《阿拉伯文学》《埃及文学》等三部书籍在纽约与伦敦同步发行,进而又唯有《中国文学》与《印度文学》等两部作品享有配套读物、即《孔子的智慧》与《东方圣书》,③可以说《中国文学》得到了主编威尔逊格外的重视。关于“配套读物”,需要说明的是,伊皮法纽·威尔逊主编的世界文学系列本身又处在一个更大的出版框架当中,包括“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在历史、传

---

① 见丁义华《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一文,刊于西方传教士(以英国传教士为主)合办的著名英文汉学刊物《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1897, Vol. 22, No. 6, pp. 758-764.

② 伟烈亚力在其巅峰成就《中国文献记略》(1867)一书种,按照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将相关文献列为四大部类:(1)经部,除四书五经外,还包括《孝经》《尔雅》以及重要字典;(2)史部,分为第一类正史、即二十四史,第二类编年史,第三类纪事本末等十五个部类;(3)子部,包含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等各方面的内容;(4)最后为集部,伟烈亚力引人注目地将之译作“美文学”(Belles Lettres),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个部类。全书分类详尽,面面俱到,囊括典籍共计 1745 种,几乎将中国重要文献一网打尽,堪称全面介绍中国最广义之“文学”经典的巅峰之作。关于该书文献统计数字,此系《英国 19 世纪的汉学史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9 年版)一书作者胡优静考订得出的统计数字,见第 36 页。

③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New York: Colonial Press, 1900. &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London: The Colonial Press, 1900.

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史诗与戏剧文学、英国文学史、东方文学(神圣与世俗)、演说与散文等方面的杰作",至 1901 年《土耳其文学》出版之时,此类作品已发行了 61 卷之多,①此后这一系列统称为《伟大的世界经典》(*The World's Great Classic*),经威尔逊推出的《中国文学》在这一整体框架中不但强化了其在西方的"经典化"过程,更明确了其在世界谱系当中的相对位置。

今日回望,美国人威尔逊在百余年前就对东方文学如此关注,并以其宏阔的眼光与辛勤的劳作,在数年内推出了一个如此庞大的世界性丛书出版系列,他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这套丛书亦应引起世界文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威尔逊的《中国文学》出版翌年,英国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 Giles, 1845-1935)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中国文学史》(1901),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作为爱德蒙·戈斯(Edmund W. Gosse)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系列之一在美国与英国同时发行,恰与威尔逊的《中国文学》及其所属的世界文学系列相互辉映,自此之后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

Early American Sinology and its No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Bridgeman's *Chinese Repository* to Wilson's *Chinese Literature*

Zhang Y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initial selection and emphasis of the translation objects by early British and American sinologists largely determined the basic outlook on the no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later. Owing to the convenience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lose ti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ir work and daily life, their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work of Chinese classics were naturally intertwined, and exerted an influence together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 this thesis, we will start from early American sinologists' translations (1830~1900)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translations made by their British counterparts in the same period, so as to analyz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American text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emergence. American Sinology in its pioneering period presented the features of inclusiveness and diversity. And due to its global insight, it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Whe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thus re-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nealogy of the whole world litera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once again acquired a brand-new significance.

Key words: early American Sinology, no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Elijah Coleman Bridgeman's *Chinese Repository* (裨治文的《中国丛报》), *Epiphanius* Wilson's *Chinese Literature* (伊皮法纽·威尔逊的《中国文学》)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See inside front cover in *Turkish Literature*, New York: Colonial Press, 1901.